

三孩政策下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研究*

——基于数量和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卿石松 温 敏

【摘 要】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精确评估生育意愿尤为重要。文章在明确区分“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的基础上,从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综合评估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拥有两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但实际的再生育意愿较低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只有一个孩子且未实现生育愿望,有意再生育一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也很低,近半数人确定不再生育,其余人则处于“可能不生”或“尚未决定”的犹豫状态。这揭示了人们在现实因素的制约性下陷入既想生又不敢生的矛盾状态,凸显不确定性在生育意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未满足的子女数量愿望增加不确定的意愿,且能激发积极的再生育意愿。未满足的男孩偏好也能够推动二孩家庭更高孩次的生育意愿。文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与方法提供了新的框架,也为理解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实现机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关键词】生育愿望 再生育意愿 不确定性 性别偏好

【作 者】卿石松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温 敏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在生育日益成为家庭自主选择的时代,生育意愿对个体生育行为及整体生育水平具有重要预测作用(Miller 等,1995; Ajzen 等,2013)。深入理解育龄妇女或夫妇的生育意愿变得尤为迫切。在中国的生育政策实践中,生育意愿被视为评估政策调整可行性和预期效果的关键参数,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以及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脱节,也激发学者们对生育意愿测量指标、方法及理论框架进行反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家庭多主体成员互动影响下的生育决策路径与机制研究”(编号:22BRK030)和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思(卿石松,2016;郑真真,2021;王军、王广州,2022),这进一步凸显了当前关于生育意愿研究的迫切需求以及既有测量的改进空间。

生育是一个相机抉择的过程,个体或家庭动态序贯地决定是否生育或再生育一个孩子。相对于初育,即生第一个孩子(成为父母),再生育的前提、背景和影响机制不同。再生育意愿属于孩次递进意愿,它考虑了当前的状况(如现有子女数量)和条件,是一个更具体的指标,能够更好地预测生育潜力和未来人口变化。尤其是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再生育意愿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本文聚焦于已育人群的再生育意愿研究。

在方法上,本文综合考虑“意愿子女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全面测量并比较处于不同孩次的个体再生育意愿的强度。以往的研究集中关注“意愿子女数量”,但这一指标无法全面反映生育意愿的强度。例如,即使被访者希望的子女数量相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和可能性或许会截然不同。因此,有必要评估特定行为意愿的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Morgan,1982;Miller等,1995)。与不确定的生育意愿相比,确定性较高的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联更紧密。研究显示,那些“肯定”打算在未来两三年内生育的人,相较于仅表示“可能”生育的人,实现生育意愿的可能性更高(Brzoowska等,2021)。此外,鉴于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个人发展的不可预测性,生育意愿作为未来行为的预测指标,其不确定性成分不容忽视(Bhrolcháin等,2019)。那些在“生育”与“不生育”之间犹豫不决的反应,往往包含关于个人生育决策真实有效的重要信息。本文通过考察这些维度的特征,为更全面准确的生育意愿分析提供新的思路。

在理论框架方面,本文基于米勒(Miller)提出的“特征—愿望—意愿—行为”(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ior,简称TDIB)模型,深入探讨再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TDIB模型强调,个体特征和生育愿望是塑造生育意愿的关键要素。其中,“愿望”代表个人的希望或期望,而“意愿”则是“受约束的愿望”,即在考虑了资源和可能性后的行动承诺(Miller,1994)。然而,在测量方面,先前的研究常将生育愿望和生育意愿混淆或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以至于尚不清楚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是由于生育愿望或生育理想降低,还是由于生育愿望转化为意愿过程中遇到限制所致。本文通过区分生育愿望和生育意愿,综合考察生育愿望的实现情况(包括子女数量和性别偏好的满足程度)及其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人们在实现生育愿望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或障碍。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结合生育意愿的数量与确定性两个维度,全面探究已婚已育群体的再生育意愿强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分析是在三孩政策实施之后,利用最新调查数据重新检验先前的理论;同时,利用更为可靠和有效的生育意愿测量指标,拓展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本文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针对已育人群开展时效性较强的再生育意愿研究,分孩次深入探究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异质性,从而深化对复杂社会经济环境中再生育意愿的理解。(2)试

图突破传统生育意愿研究的局限,结合意愿子女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为生育意愿的多维度测量提供新的方法论框架。(3)不仅在数量维度区分生育愿望(理想子女数)和生育意愿,还检验含性别偏好的生育愿望和再生育意愿的差异和联系。对于近期讨论热烈的“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等问题,进行经验上的实证分析和回应,通过比较理想子女数与现有子女数之间的差异评估“是否想生”,并检验“想生”(未实现的生育愿望)与“敢生”或“打算再生育”之间的关联程度。这些分析和检验有助于深化对生育决策过程的认识,也为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实现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与文献述评

生育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涉及多种利弊因素的权衡,这些因素又常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因此,生育意愿作为生育决策的前置考虑,往往呈现出复杂、矛盾或不确定的特点。在调查研究中,若不充分考虑生育意愿的多维性和复杂性,或忽视其不确定性,则可能导致预测结果的偏误。鉴于此,仔细审视“生育意愿”的概念和设计合理的操作化测量不可或缺。这是深入理解生育意愿的内涵、更有效地预测和判断生育水平的重要路径。

(一) 生育意愿及其预测作用

不同的理论模型为生育意愿的概念建构及测量提供了多样的视角。计划行为理论强调,意愿是“人们愿意或计划付出多大努力来实现某种行为”的指示器(Ajzen, 1991)。在这一框架下,意愿主要受自身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到的行为控制的影响。意愿的强烈程度与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可能性正相关。并非所有生育意愿都能如愿转化为生育行为,这种差异在直观上体现为生育意愿的预测力不足。与计划行为理论不同,Miller(1994)的生育决策过程模型明确区分了生育愿望和生育意愿。在该模型中,生育意愿是生育愿望与生育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愿望先于意愿存在。愿望被视为一种内在的心理需求,意愿则是为实现愿望做出的计划和承诺。

在实践中,愿望与意愿的混淆使用是导致生育意愿预测力低下的原因之一。例如,以往研究常以“理想子女数”作为生育意愿的代理指标,通过询问“您认为几个孩子最理想”等问题来操作化测量。但这种方式更接近于偏好或愿望的表达,而非对生育行为的承诺。若以理想子女数来预测实际生育行为,无疑会扩大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距(Chen等, 2017)。事实上,生育转变后,理想子女数较实际生育数往往有偏高的倾向,这进一步凸显了区分愿望与意愿的重要性。生育意愿涉及(在特定时间内)关于生育一个孩子或推进孩次的行动、承诺和计划,该指标对生育行为的预测效度更高(郑真真, 2014)。

生育意愿研究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所有育龄群体采用统一的测量指标。如询问所有育龄妇女“打算生几个孩子”,并将其作为意愿子女数或孩次数的评估指标。这种做法

隐含假设生育决策是一次性的,人们事先决定想要的子女数量并在实现这个目标时停止生育。实际上,每个孩子的出生都会对家庭环境和条件产生影响,生育是一个连续决策的过程。例如,有研究发现,人们会根据当前的生活环境调整自己的生育偏好或意愿(Trinitapoli 等,2018),而且影响生育决定的因素也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化(Iacovou 等,2011)。从生命历程的视角看,初育和再生育的决策背景和前提存在显著差异。在尚未生育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养育孩子的经历,而是否再要一个孩子的前提是育龄夫妇已经成为父母,拥有生育和抚养孩子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生育的态度、主观规范、感知的行为控制,以及生育成本和收益的评估,进而影响其后续的生育意愿。因此,在分析生育意愿时,有必要明确区分不同孩次的生育意愿,并专门针对已有子女的育龄人群进行深入研究。

(二) 生育意愿的不确定性

在改进生育意愿测量方式和指标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意愿的不确定性。是否生育或再生育一个孩子是个体和家庭面临的重大选择之一,感知的行为控制和对未来前景的预测显著影响人们的生育计划。在稳定且可预测的环境中,人们更有可能制定明确的生育计划;相反,在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环境中,人们往往难以预测生育的后果,从而表现出矛盾、犹豫或延迟生育的倾向。在风险社会或不确定上升的背景下,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被访者对自己的生育意愿持有模糊或不确定的态度(Bernardi 等,2015)。Bhrolcháin 等(2019)甚至认为人们的生育意愿是临时建构的,其可变性和环境依赖性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不确定的生育意愿才是常态。而且,不确定的被访者更有可能调整和改变生育计划(Jones,2017)。换言之,不确定的生育意愿是不稳定和暂时的,可能处于肯定打算生育和不打算生育之间的过渡阶段(Kuhnt 等,2021)。从这个角度看,在生育意愿调查中回答“不确定”或“不知道”是有效且有意义的回应,不应被视为缺失值或无效值(Morgan,1982)。

近年来,部分学者在测量生育意愿时增加了“不确定”选项,以更贴近育龄人群的真实想法。例如,使用“非常确定”“相当确定”“不太确定”和“一点也不确定”这些不同程度的确定性区分生育意愿的坚定程度(Testa,2014)。在世代和性别调查(GGS)中,也要求被访者回答“肯定不生”“可能不生”“可能生”或“肯定生”来测量生育意愿及其确定性程度(Brzozowska 等,2021)。这些调查研究均表明,不确定的生育意愿普遍存在,因此本文将“不知道”等不确定的回应与确定的意愿区分开,并全部纳入分析样本,以提高生育形势预测的准确性。

国内文献大多关注数量维度上的生育意愿,即意愿子女数,或者采用二分法来调查“是否有生育或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意愿”,通常不考虑生育意愿的确定性程度。即使部分被访者做出“不知道”“没想好”等真实有效的回应,研究者也往往将其视为无效值或简

单归类为“没有意愿”。风笑天(2022)指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结果的认知偏差和错误应用。一项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回应“是否打算再生育一个孩子”时,“80后”和“90后”已育一孩的人群中有接近或超过1/3表示“没想好”(陈芳、刘越,2021)。显然,将“没想好”这个选项排除在外或人为地将其视为不打算生育会导致样本代表性和测量效度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中国文化情境下,生育意愿尤其是高孩次的再生育意愿的不确定性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生育意愿已经积累了较多成果,但仍存在改进空间。首先,初次生育和再生育的决策机制与过程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一般性的生育意愿或生育决策理论上,专门针对再生育意愿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和测量方式有待完善,以提高预测效力。最后,生育意愿的不确定性实际存在,且有意义,关注这一特征有助于提高测量效度并为生育决策过程提供新的认识。基于此,本文从数量和确定性两个方面探究不同孩次育龄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及影响因素,以期相关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参考和依据。

三、数据、变量与描述性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数据。该调查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10136个家庭,不仅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而且提供了与生育相关的多方面信息,包括被访者的生育愿望(如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和实际生育情况,以及50岁以下已育被访者(不限性别)的再生育意愿。尤其可贵的是,再生育意愿采用了更为贴合实际的新颖测量指标,为有效测量再生育意愿,深入分析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和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基础。

根据研究目的及再生育意愿的可实现性,本文选取年龄为45周岁及以下(1976年及以后出生)已婚有配偶且有子女的育龄人群为研究对象,并保留重要变量取值有效的样本,最终得到2381个样本。与仅限女性育龄样本的研究不同, CSS调查涵盖男性,因此本研究可以了解男性的再生育意愿,并比较性别之间的异同。

(二) 变量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再生育意愿,通过询问已有子女的被访者“您还打算要几个孩子”测量。选项包括“肯定不要了”“可能不要了”“还没有想好”“再要一个”“再要两个”和“再要三个及以上”。这一测量不仅涵盖再生育意愿的数量维度,还包含了确定性或可能性的信息。其中,“肯定不要了”表示明确但消极的生育意愿,意味着他们缺乏再生育的动力。“可能不要了”和“还没有想好”均为生育意愿不确定的表现,但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

(Bernardi 等, 2015)。“可能不要了”意味着被访者没有强烈的再生育意愿,但也不排除再生育的可能性,他们对再生育持开放和不承诺的态度。“还没有想好”反映被访者一种矛盾和犹豫的状态,在想要孩子和不想要孩子之间摇摆不定,或者根本无法表达出来。相对来说,“再要一个”“再要两个”“再要三个及以上”是明确、积极且强度依次递增的再生育意愿。考虑到“再要三个及以上”的样本较少,本文将“再要两个”和“再要三个及以上”进行合并分析。

借鉴 TDIB 模型,本文区分生育愿望和生育意愿,考察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生育愿望是生育意愿或再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这在以往相关文献中已得到印证(Chen 等, 2017)。不过,考虑到再生育意愿受生育愿望和现有子女数的共同影响,未实现的生育愿望才能更好地预测后续的生育意愿。例如,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来说,如果想生两个或更多的孩子,打算再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但如果本来就只想生一个孩子(愿望已经实现),再生育的意愿往往很低。因此,本文以“理想子女数”对生育的数量愿望进行操作化测量,并通过理想子女数和现有子女数的相对关系构建“是否已实现期望生育数量”。如果现有子女数大于等于理想子女数,视为“已实现期望生育数量”(赋值为 0),否则视为“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赋值为 1),并检验其对不同孩次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考虑到生育愿望的多维特征,本文参照现有文献做法(宋健、陈文琪, 2022),将性别偏好作为生育的性别愿望,并检验子女性别偏好的满足情况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子女性别偏好的满足情况根据实际子女性别构成和理想子女性别构成的对比特征来分类,其中,实际的子女性别结构与理想相同,或单一性别偏好(理想只生育男孩/女孩)的人已经儿女双全,以及对子女性别没有偏好的界定为已实现性别偏好,其余情况为未实现性别偏好,进一步细分为“男孩偏好未实现”和“女孩偏好未实现”;前者包括持混合性别偏好(既生育男孩也生育女孩)或者单性别男孩偏好但目前只生育了女孩的情况,后者表示持混合性别偏好或者单性别女孩偏好但目前只生育了男孩的情况。

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生育意愿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及其平方,居住地(城镇为 1,农村为 0),民族(少数民族为 1,汉族为 0),就业状况(就业为 1,未就业为 0)。此外,还控制了家庭和配偶特征变量,具体包括现有子女数,家庭年收入(对数)和住房状况(有两套及以上自有住房赋值为 1,否则为 0),被访者的兄弟姐妹数,以及夫妻教育匹配特征等。其中,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参照赵梦晗(2019)的做法,分为同质婚(包括同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五类)、梯度婚(妻子教育水平低于丈夫)和女性向下婚(妻子教育水平高于丈夫),以此考察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表 1 变量描述性分析(N=2381)

变 量	均值 / 百分比	变 量	均值 / 百分比
期望生育数量(个)	2.05	现有子女数(个)	1.77
0 个	0.71%	1 个	36.33%
1 个	9.32%	2 个	52.16%
2 个	77.70%	3 个及以上	11.51%
3 个及以上	12.26%	教育婚配模式	
期望生育数量已实现	65.69%	同为小学及以下	6.93%
性别偏好已实现	61.91%	同为初中	27.13%
性别(男性=1)	0.37	同为高中	9.32%
居住地(城镇=1)	0.62	同为大专	5.29%
年龄	36.38	同为大学本科及以上	8.15%
民族(少数民族=1)	0.10	梯度婚	25.03%
就业状况(就业=1)	0.80	女性向下婚	18.14%
家庭收入(元,取对数)	11.24	兄弟姐妹数(个)	1.81
有两套及以上住房	0.21		

(三) 描述性分析

1. 变量基本特征

表 1 给出了被访者的基本特征。被访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2.05 个,有近九成的被访者希望拥有两个及以上的孩子。这表明即使在低生育背景下,生育两个孩子仍是主流规范。大约 35% 的被访者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现有子女数均值为 1.77。不

过,仅有 10%左右的育龄人群持有积极的再生育意愿(见表 2),同时较大一部分育龄人群困于“想生但不敢生”的境地,这不仅印证生育愿望和生育意愿的差异,更表明再生育意愿的低迷。性别偏好的实现建立在实现生育数量愿望的基础上,且有更大的随机性,因此性别偏好的实现程度(61.91%)略低于数量愿望(65.69%)。夫妻教育婚配模式中同质婚占主体,其中同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27.13%,梯度婚(女低男高)略高于女性向下婚。

2. 分孩次的再生育意愿

如表 2 所示,在总样本中,72.36%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不再生育,仅有 10.33%的人有明确的再生育打算。值得注意的是,大约 17.31%的被访者处于“可能不要了”或“还没有决定”的不确定状态。在较为宽松的三孩政策环境下,即使在仅有一个孩子的育龄群体中,有“再要一个”或“再要两个及以上”孩子愿望的比例仅为 22.43%。其中,“肯定不要”的被访者占 50.29%,而表示“可能不要”的占 13.29%，“还没有想好”的占 13.99%。这些数据表明,当前育龄人群的再生育意愿普遍低迷。

再生育意愿与现有子女数之间的关系表明,随着现有子女数的增加,“肯定不要”的比例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此外,再生育意愿中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尤其在

表 2 分孩次的再生育意愿

单位:% 只有一个孩子的

现有子女数	再生育意愿				
	肯定不要	可能不要	还没有想好	再要一个	再要两个及以上
1 个(N=865)	50.29	13.29	13.99	20.81	1.62
2 个(N=1242)	83.90	7.89	4.75	2.74	0.72
3 个及以上(N=274)	89.78	5.84	1.09	2.19	1.09
合计(N=2381)	72.36	9.62	7.69	9.24	1.09

育龄群体中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与国内同类研究结果一致(陈芳、

刘越,2021; Bhrolcháin 等,2019; Bernardi 等,2015)。这些结果进一步强调,深化生育意愿的内涵和设计合理的多元化测量方式极为重要。简单的二分测量法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再生育意愿的复杂性,导致对其强度的估计偏差。至于不确定的再生育意愿最终如何转化,还需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来探讨。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再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如表 3 所示,给定任意孩次,女性的再生育意愿普遍低于男性。在数值上,女性明确表示不再生育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以仅有一个孩子的样本为例,女性中有 55.43%的人选择“肯定不要”,而男性中这一比例为 42.69%。另外,女性表达“再要一个”或更多孩子的积极生育意愿的比例也相对较低。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现有子女数量的增加,不确定的和积极的再生育意愿占比均有所下降。这一发现再次印证了生育意愿在不同孩次之间的变化,揭示了生育意愿形成和决策中显著的性别差异。

表 3 按性别和现有子女数划分的再生育意愿 单位: %

现有 子女数	再生育意愿									
	女性(N=1509)					男性(N=872)				
	肯定 不要	可能 不要	还没有 想好	再要 一个	再要两个 及以上	肯定 不要	可能 不要	还没有 想好	再要 一个	再要两个 及以上
1 个	55.43	13.18	11.05	18.60	1.74	42.69	13.47	18.34	24.07	1.43
2 个	86.76	6.80	3.89	2.07	0.49	78.28	10.02	6.44	4.06	1.19
3 个及以上	93.53	4.12	0.00	2.35	0.00	83.65	8.65	2.88	1.92	2.88
合计	76.81	8.68	5.90	7.75	0.86	64.68	11.24	10.78	11.81	1.49

3. 生育愿望的满足与再生育意愿

正如前文所述,再生育意愿不仅受已有子女数的影响,也受个人生育愿望的塑造。为此,本文进一步分析期望生育数量是否实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根据表 4 的数据,在调查样本中,有一部分育龄人群已经实现了期望生育数量,但仍有 34.31%的人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这一结果与宋健和陈文琪(2022)的研究发现相符,即在已有子女的育龄人群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育愿望未得到满足。

与理论预期一致,在已经实现期望生育数量的群体中,大多数(86.38%)表示不打算再生育,可见生育愿望的满足是他们选择不再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那些尚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的群体中,仍有高达 45.53%的人选择不再生育。这表明,即使部分处于不确定或犹豫状

态(“可能不要”占 13.22%,”还没有想好”占 14.69%)的育龄人群最终选择再

表 4 期望生育数量与再生育意愿 单位: %

期望生育数量 是否实现	再生育意愿				
	肯定不要	可能不要	还没有想好	再要一个	再要两个及以上
已实现(N=1564)	86.38	7.74	4.03	1.66	0.19
未实现(N=817)	45.53	13.22	14.69	23.75	2.82

生育,也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考虑现实情况后决定不再追求自己对子女数量的愿望。这反映育龄人群在生育愿望转换为生育意愿的过程中,受到多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导致“不敢生”或“不想生”,从而形成生育愿望与生育意愿之间明显的差距。

表 5 按现有子女数划分的期望生育数量实现情况及再生育意愿 单位: %

	现有子女数		
	1 孩(N=865)	2 孩(N=1242)	3 孩及以上(N=274)
已实现期望生育数量	19.77	91.30	94.53
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	80.23	8.70	5.47
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			
肯定不要	43.80	56.48	46.67
可能不要	13.54	11.11	13.33
还没有想好	15.13	12.96	6.67
再要一个	25.50	13.89	13.33
再要两个及以上	2.02	5.56	20.00

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育龄人群的再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是否存在背离?为分析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比较不同现有子女数的育龄人群中,生育愿望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匹配程度。表 5 显示,期望生育数量未实现

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现有一孩的育龄群体中。其中,高达 80.23%的人未实现生育愿望。在这些已育一孩且生育愿望未实现的人群中,近半数表示不打算再生育,仅有 27.52%的人具有积极的再生育意愿。相比之下,在现有二孩及以上的育龄人群中,实际生育行为与期望生育数量的匹配度较高,超过 90%的人实现了期望生育数量。

从不同现有子女数情形下再生育意愿与期望生育数量的关系看,现有一个孩子的育龄人群面临较大的矛盾。他们渴望扩大家庭规模,但在现实生活中倾向于不再生育,实际“打算生”的比例相对较低。这种现象揭示了基于现有子女数的再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之间的偏差。这意味着,直接以生育愿望来推测生育行为可能不准确(郑真真,2014)。尽管生育愿望并不完全等同于生育意愿,但现有一孩的育龄人群面临的矛盾更加突出,导致育龄夫妇在“生”与“不生”的选择中犹豫不决。因此,相比鼓励已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再生育,现有一孩的育龄人群在再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之间的鸿沟更值得关注。如何有效促使这一群体实现生育愿望显得尤为关键。

除了数量愿望,本文还分析了是否实现性别偏好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联系。如表 6 所示,已实现性别偏好的育龄人群中,高达 82.70%的人选择不再生育。相比之下,性别偏好未实现时,育龄人群中表达不确定和积极再生育意愿的比例显著提升。具体而言,在男孩偏好未实现的情况下,育龄人群更倾向于表达积极再生育意愿,特别是选择“再要一个”孩子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当女孩偏好未实现时,积极再生育的意愿相对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未实现性别偏好的育龄人群中,超过 98%(893 人)持有混合的性别偏好,即希望儿女双全。这表明,尽管男孩偏好逐渐减弱,混合性别偏好已成为主流,但男孩偏好激发的再生育意愿仍然比女孩偏好更为积极。这暗示传统生育文化中的男孩偏好仍然存在且能发挥作用。子女性别偏好可能对育龄人群的再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表 6 性别偏好的满足与再生育意愿 单位: %

性别偏好	再生育意愿					合计
	肯定不要	可能不要	还没有想好	再要一个	再要两个及以上	
已实现(N=1474)	82.70	7.94	5.43	3.32	0.61	100.00
未实现(N=907)	55.57	12.35	11.36	18.85	1.87	100.00
男孩偏好未实现(N=322)	40.99	13.35	11.80	31.06	2.80	100.00
女孩偏好未实现(N=585)	63.59	11.79	11.11	12.14	1.37	100.00

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上述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再生育意愿与现有子女数及生育愿望实现情况有密切相关性。为深入理解这一关系,本文采用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这些因素之间的作用。为简化模型,本文将“可能不要”和“还没有想好”的选项合并为不确定的生育意愿。由于有序 logit 模型未能通过平行性假设检验,本文借鉴陈芳和刘越(2021)的研究方法,采用多项 logit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一) 总样本回归结果

表 7 展示了多项 logit 回归结果,模型考虑了期望生育数量、性别偏好满足情况以及个人、家庭和配偶特征变量。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的育龄人群表现出更积极的再生育意愿,倾向于选择“再要一个”或“再要两个及以上”;持不确定性再生育意愿的概率也高于消极的“肯定不要”。这表明未实现的生育愿望可能导致矛盾或犹豫的再生育意愿,甚至转化为对再生育的积极承诺。这些结果与来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研究结论相似,即生育愿望尤其是未实现的生育愿望,是决定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Chen 等,2017)。此外,由于不确定的意愿有可能转化为肯定的、积极的意愿,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未实现的性别偏好也显著影响再生育意愿。尤其是当男孩偏好未实现时,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意愿较高,女孩偏好未实现则对再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的实现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上,如果子女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没有实现,育龄人群极有可能通过选择再生一个孩子来满足自己的偏好,反映出中华传统生育观念中生育男孩倾向的延续。

此外,现有子女数对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仅有一个孩子的育龄人群持不确定性或积极再生育意愿的可能性均较高,而已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育龄人群更有可能表现出不再生育的倾向。这种孩次异质性验证了生育决策的序贯性,即生育并非一次性决策,而是随着家庭规模接近理想,生育意愿趋于稳定和不再生育,不确定的生育意愿随之减少(Morgan,1982)。总之,本文通过区分生育愿望和生育意愿,深化了对理想子女数及性别偏好、现有子女数、再生育意愿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

表 7 再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多项 logit 回归结果 (N=2381)

	不确定	再要一个	再要两个及以上
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	0.972*** (0.13)	2.572*** (0.28)	3.969*** (0.52)
性别偏好 (已实现为参照)			
男孩偏好未实现	0.806*** (0.27)	1.900*** (0.34)	1.587*** (0.56)
女孩偏好未实现	0.032 (0.17)	0.126 (0.23)	0.050 (0.44)
男性	0.947*** (0.15)	0.982*** (0.22)	0.978** (0.40)
年龄	0.191 (0.12)	-0.087 (0.16)	-0.914*** (0.22)
年龄平方	-0.005*** (0.00)	-0.002 (0.00)	0.011*** (0.00)
城镇	-0.062 (0.13)	-0.423** (0.20)	-0.574** (0.29)
少数民族	0.348 (0.29)	0.279 (0.36)	0.912 (0.58)
有工作	-0.192 (0.16)	-0.188 (0.26)	0.078 (0.56)
兄弟姐妹数	0.113 (0.06)	0.099 (0.08)	0.013 (0.17)
现有子女数 (2 个为参照)			
1 个	0.570*** (0.21)	0.664** (0.32)	-1.130** (0.54)
3 个及以上	-0.632** (0.29)	0.084 (0.58)	0.662 (0.50)
家庭收入	0.028 (0.06)	0.181** (0.09)	0.523** (0.23)
有两套及以上住房	-0.149 (0.17)	0.192 (0.24)	0.098 (0.43)
教育婚配模式 (同为初中为参照)			
同为小学及以下	0.187 (0.40)	-0.095 (0.54)	0.399 (0.66)
同为高中	0.399 (0.27)	-0.242 (0.37)	0.545 (0.71)
同为大专	0.088 (0.27)	0.050 (0.43)	-0.155 (1.20)
同为本科及以上	0.776*** (0.23)	0.770** (0.38)	0.563 (0.72)
梯度婚	0.399** (0.19)	0.206 (0.33)	-0.150 (0.64)
女性向下婚	0.318 (0.22)	0.327 (0.27)	0.385 (0.76)
常数项	-2.836 (1.94)	-1.137 (2.72)	5.530 (3.08)

注：表格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肯定不要了”为参照组），括号内的数字为聚类到省级层面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5%、1% 的水平上显著。

居民更倾向于不再生育，这可能与城镇育龄人群面临的养育负担、竞争压力更大有关。家庭收入较高、高学历夫妻更可能选择再生育，这意味着经济基础是培育积极的再生育意愿的重要条件。

（二）分孩次的回归结果

上述分析均表明，已育人群的再生育意愿与现有子女数密切相关，显示出序贯生育决策的特征。本文进一步采用孩次别的分析方式，着重探讨一孩和二孩样本中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见表 8 和表 9）。

在一孩样本的回归结果中，未实现的子女数量愿望显著促进再生育意愿，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一致。相对于消极的“肯定不要”，未实现的数量愿望不仅会导致可能生或不生的犹豫状态，而且能显著增加再要一个或更多孩子的积极再生育意愿。这进一步验证了

最后，模型中其他因素如性别、居住地、家庭收入和夫妻教育匹配也对再生育意愿有一定影响。男性比女性的再生育意愿更强，这一性别差异表明在研究生育意愿时，仅考虑女性是不够的，男性的生育意愿同样值得关注。女性作为生育主体，更有可能因母职与事业发展的相互挤压而表现出相对较低的再生育意愿。城镇居民比农村

Miller 等(1995)生育决策过程模型中生育愿望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序次关系。然而,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不同,一孩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偏好未实现

对积极再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按照变量定义和样本特征,“男孩偏好未实现”和“女

孩偏好未实现”分别意味着目前只有1个女儿和1个儿子,而儿女双全是主流愿望。因此对于一孩人群来说,性别偏好未实现和子女数量愿望未实现高度相关。很大程度上只有实现数量愿望,才有可能实现性别偏好,或者说实现性别偏好需要以增加子女数量和家庭规模为前提。因此,在数量愿望尚未实现的情况下,性别偏好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二孩样本的回归结果揭示,未实现的子女数量愿望依然能增强积极的再生育意愿。这与总样本和一孩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此外,未实现的男孩偏好显著促进“再要一个孩子”的积极意愿。与此相反,未实现的女孩偏好(已有两个儿子)对再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表明男孩偏好在实际生育实践中仍然存在。如果已有两个儿子,即使存在“儿女双全”的混合性别偏好或未实现的女儿偏好,人们也倾向于不再生育。相反,如果没有儿子,二孩育龄人群依然有再生育的动力,未实现的男孩偏好是激发三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动因。当然,未实现的男孩偏好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确定的再生育意愿,这或许是出于生育性别随机性以及

对养育负担考量的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生育愿望对不同孩次的育龄人群再生育意愿存在异质性影响。一孩人群的积极再生育意愿主要由数量愿望驱动,而二孩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受数量愿望和男孩偏好的共同影响。这表明,对再生育意愿的全面理解,需要考虑子女数量愿望、性别偏好和现有子女数之间的综合影响。这也是本文分孩次比较分析再生育意愿强度和影响因素的动机所在。

其他变量分析也提供了关于不同孩次人群再生育意愿形成的有价值信息。值得关

表 8 一孩群体再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多项 logit 回归结果(N=865)

	不确定	再要一个	再要两个及以上
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	1.779*** (0.29)	3.611*** (0.85)	13.736*** (1.11)
性别偏好(已实现为参照)			
男孩偏好未实现	-0.540 (0.32)	0.784 (0.44)	1.910 (1.09)
女孩偏好未实现	-0.820*** (0.26)	-0.573 (0.34)	0.612 (1.38)
男性	0.831*** (0.19)	0.822*** (0.23)	0.366 (0.58)

注:同表 7,其他控制变量结果略。

表 9 二孩群体再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多项 logit 回归结果(N=1242)

	不确定	再要一个	再要两个及以上
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	1.008*** (0.28)	2.493*** (0.37)	3.838*** (0.47)
性别偏好(已实现为参照)			
男孩偏好未实现	1.962*** (0.31)	2.907*** (0.49)	1.694 (1.04)
女孩偏好未实现	0.454 (0.26)	0.489 (0.36)	-1.184 (0.90)
男性	0.972*** (0.23)	1.262 (0.67)	0.752 (0.63)

注:同表 7,其他控制变量结果略。

注的是,男性始终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再生育意愿,这可能与男性在家庭决策中和家务分工的角色有关。考虑到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可能因性别而异,为此针对男女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10),生育愿望(子女数量和性别偏好)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在男性和女性间大体一致。未实现的子女数量愿望和男孩偏好对男性和女性的积极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而未实现的女孩偏好则没有显著影响。细微的差别在于,女性在子女数量愿望未实现时更倾向持不确定的再生育意愿,而男性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积极意愿。总之,尽管男女在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展现出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和相似之处的发现为后续开展更为细致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表 10 分性别的再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多项 logit 回归结果

	男性(N=872)			女性(N=1509)		
	不确定	再要一个	再要两个及以上	不确定	再要一个	再要两个及以上
未实现期望生育数量	0.359 (0.25)	2.533*** (0.46)	5.618*** (1.12)	1.468*** (0.21)	2.626*** (0.40)	3.253*** (0.78)
性别偏好(已实现为参照)						
男孩偏好未实现	1.226*** (0.45)	1.951*** (0.42)	2.194** (1.09)	0.498 (0.30)	1.914*** (0.42)	2.086*** (0.74)
女孩偏好未实现	0.438 (0.34)	0.586 (0.31)	0.543 (0.86)	-0.298 (0.28)	-0.339 (0.33)	0.088 (0.64)

注:同表7,其他控制变量结果略。

综上所述,通过综合考虑意愿子女“数量”和“确定性”两个关键维度,不仅界定已育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而且反映出不同强度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尽管多数人倾向于生育两个孩子,但实际的再生育意愿并不高,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一现象揭示育龄人群在生育决策过程中的内心矛盾和挣扎,他们在满足生育愿望与应对现实生活挑战之间寻求平衡。此外,研究发现凸显了更为细致和多元化的生育意愿测量方法的重要性,分析未实现的生育愿望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们在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上的选择。这不仅为把握和预测生育行为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制定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和干预策略提供启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综合性的测量方法,考虑“意愿子女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全面评估已育人群再生育意愿的强度。同时,通过对生育愿望(包括子女数量和性别偏好)、现有子女数和再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探究,为理解再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研究结果显示,育龄人群普遍表现出较低的再生育意愿,这与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和多孩生育率在政策调整下没有持续提升的现实相呼应。大多数被访者选择不再生育,仅

有一小部分表达了明确的再生育打算。此外,已育人群中的不少人表现出犹豫不决或不确定的再生育意愿。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虽然拥有两个孩子是主流愿望,但在仅有一个孩子且子女数量愿望尚未实现的样本中,仅有 27.5%明确打算再要一个或更多孩子,而“肯定不要”的样本占一半左右,另有 28.7%的人“可能不要”或“还没有想好”。这种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之间的巨大差异,体现了人们在生育决策过程中的复杂困境和矛盾心态,并暗示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并非因为生育意愿下降,而是源于生育愿望难以实现。

与 TDIB 模型的预测相符,未实现的子女数量愿望对再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不论现有子女数量如何,未实现的生育愿望往往会压抑消极的再生育意愿,引发矛盾或犹豫的生育意愿状态,甚至激发更积极的再生育意愿。不同子样本(如一孩和二孩家庭、男性和女性被访者)中均验证了子女数量愿望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子女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对再生育意愿的作用也值得关注。在两个孩子均为女孩的家庭中,未实现的男孩偏好可能激发再生育的考虑。此外,再生育意愿也受到个体和家庭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本文在理论上拓展现有的生育研究,提出了更符合实际的生育意愿测量框架,考虑子女数量与性别偏好的综合影响,对推进相关研究具有启示意义。生育愿望与生育意愿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表明,在现实约束下形成的生育行动计划或承诺可能是更准确的生育意愿测量指标。同时,也强调不确定性在生育意愿中的重要性,生育意愿应被视为一个连续体,而非简单的二分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生育决策的矛盾和犹豫是普遍现象。准确捕捉这些信息对评估生育意愿的强度和预测准确性至关重要。因此,在生育意愿的调查设计中纳入“不确定性”选项是合理且必要的,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人们的真实想法和需求。本文使用截面数据对不确定性生育意愿及其特征进行探索,期望提出新的问题并借此引发学术界新的思考和讨论,进而推动生育意愿研究框架创新和实践发展。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和政策环境中,未来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不确定性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与积极意愿的差异及其对实际生育行为的不同影响。此外,考虑到生育决策的顺序性和递进性,需要重点关注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孩次异质性。探索生育愿望、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不同生育支持政策中发挥作用,将为理解生育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新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对帮助育龄人群实现生育愿望、提升生育或再生育意愿、引导不确定生育意愿向积极方向转化具有政策参考价值。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是由再生育意愿较低所驱动,缩小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的差距、缓解“想生不敢生”的问题是激活生育潜力的关键。从生育支持的角度看,相对于“肯定不生”的人群,“可能生”或“还没想好”的人群是可争取的对象。为他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措施,也许能够促进再生育意愿由不确定性向积极的过渡,从而提升生育率。同时,大部分人不想再

生育,或许是因为他们害怕抚养孩子的巨大责任和高昂的成本,以及对未来生活缺乏足够信心。这反映了育儿的巨大压力,也间接反映了社会支持与家庭需求间的隐性差距。除非政府愿意为渴望更多孩子的个体和家庭提供支持,否则任何鼓励育龄人群生三个孩子的努力似乎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此外,从生育文化的角度来讲,重视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等社会规范在塑造积极再生育意愿中的作用,通过建设新型婚育文化、加强文化宣传和思想引导,提升人们的内生动力,从而缓解“不想生”的问题,也是制定有效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陈芳、刘越(2021):《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真的很低吗?——基于对研究对象偏差的修正》,《人口学刊》,第1期。
2. 风笑天(2022):《调查结果如何误导我们的认识——以二孩生育意愿调查中的方法问题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
3. 卿石松(2016):《生育意愿如何调查》,《光明日报》,1月18日第11版。
4. 宋健、陈文琪(2022):《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满足情况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基于生育三维视角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5期。
5. 王军、王广州(2022):《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6. 赵梦晗(2019):《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配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人口学刊》,第3期。
7. 郑真真(2014):《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8. 郑真真(2021):《新形势下的生育意愿研究框架:家庭和性别的视角》,《人口与社会》,第5期。
9. Ajzen I.(1991),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2):179-211.
10. Ajzen I.,Klobas J.(2013),Fertility Intentions:An Approa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emographic Research*. 29:203-232.
11. Bernardi L.,Mynarska M.,Rossier C.(2015),Uncertain,Changing and Situated Fertility Intentions:A Qualitative Analysis. *Reproductive Decision-Making in a Macro-Micro Perspective*. Dordrecht:Springer Netherlands.
12. Bhrolcháin M.N.,Beaujouan É.(2019),Do People Have Reproductive Goals? Constructive Preferences and the Discovery of Desired Family Size. In Schoen R. (ed.),*Analytical Family Demography*. Cham:Springer.
13. Brzozowska Z.,Beaujouan E.(2021),Assessing Short-Term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their Realisation Using the 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Pitfalls and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7(2):405-416.
14. Chen M.,Yip P.S.F.(2017),The Discrepancy between Ideal and Actual Parity in Hong Kong:Fertility Desire, Intention,and Behavior.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6(4):583-605.
15. Iacovou M.,Tavares L.P.(2011),Yearning, Learning, and Conceding:Reasons Men and Women Change Their Childbearing Inten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1):89-123.
16. Jones R.K.(2017),Are Uncertain Fertility Intentions a Temporary or Long-Term Outlook? Findings from a Panel Study. *Women's Health Issues*. 27(1):21-28.

17. Kuhnt A., Minkus L., Buhr P. (2021), Uncertainty in Fertility Intentions from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Which Life Course Markers Matter?. *Journal of Family Research*. 33 (1): 184–208.
18. Miller W.B. (1994),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Desires, and Intent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Genetic, Social &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0(2): 223–252.
19. Miller W.B., Pasta D.J. (1995), Behavioral Intentions: Which Ones Predict Fertility Behavior in 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6): 530–555.
20. Morgan S.P. (1982), Parity-Specific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Uncertainty: The United States, 1970 to 1976. *Demography*. 19(3): 315–334.
21. Testa M.R. (2014), On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Europe: Individual and Country-Level Evidence.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21: 28–42.
22. Trinitapoli J., Yeatman S. (2018), The Flexibility of Fertility Preferences in a Context of Uncertain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4(1): 87–116.

Analysis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for Additional Births in the Three-Child Policy Era: Viewing from Quantity and Certainty Perspectives

Qing Shisong Wen Min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rates, accurate assessment of fertility intention is crucial.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fertility desire", introducing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assess the strength of parents' intentions to have more children, considering both quantity and certainty aspec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despite a general preference for two children as the ideal, actual intentions to enlarge families are remarkably low and uncertain. Even among the parents having only one child and not achieved their desired family size, there is a discernible reluctance to pursue additional children. Nearly half of these parents are resolute in not having more children, with the rest fluctuating between reluctance and indecision. This indecision highlight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desire for more children and practical barriers.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influence of uncertainty in fertility planning and establishe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desires, the current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intention to have another child. Unfulfilled desires for a specific number of children not only heighten the uncertainty of decision-making but also bolster positive intention for another child. Furthermore, the unmet preference for a son among families with two daughters can influence the intention to consider having another child.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novel framework for the precise measurement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offering essential insights for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policy formulations concerning fertility intention dynamics.

Keywords: Fertility Desire; Intention for Additional Births; Uncertainty; Gender Preference

(责任编辑:李玉柱)